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王明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王明生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 王明生著.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305-09226-8

I. ①当… II. ①王… III. ①政治制度—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17946 号

出版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出版人 金鑫荣

书 名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与逻辑
著 者 王明生
责任编辑 郭艳娟 施 敏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5.25 字数 362 千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226-8
定 价 70.00 元

网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号: njupress
销售咨询热线: (025)83594756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自序

政治发展既是政治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独立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风雷激荡的20世纪，中国的政治发展步履维艰、跌宕起伏。面对列强的欺凌、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专制统治的淫威、封建迷信的盛行，中国的政治发展面临救亡与启蒙的双重责任。而政治环境的复杂多变、社会生态的复杂多元、文化传统的良莠不齐，既使中国政治发展深深镌刻上民族性格的烙印，也束缚了自由、民主、科学思想的落地生根。

当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时，“民主”与“科学”的启蒙呐喊变成了一个时代符号。随之而来的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地竞逐迸放，各个社会群体和阶层，从自身的立场、观点和理想出发，奔走呼号，布道施策，绘就了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政治发展大戏。这出大戏不时变换时代主角，形塑了一场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话剧。

政治发展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在政治发展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相互交融，演绎出不同的政治发展特征。如公民政治参与的积极性、服从合法权威、遵守法律的意识、对民主精神的认同，以及尊重和包容不同意见的胸怀等。

政府发展的历史演进也深受主导政治发展进程的政党、组织或者权威的

价值目标、价值准则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与制约。不同的价值观将会引领政治发展的不同发展方向。

基于上述认识,本人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以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曲折发展历程,剖析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发展规律和历史逻辑。

该书作为本人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部分文章合集,共分为五个部分。

一是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离不开中国文化与国内外社会思潮的影响。这部分剖析了儒家治政伦理、国内外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发展中的博弈与论争,揭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思想源流与相关政治流派的政治诉求。

二是革命根据地与政治发展研究。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雏形。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建设及其产生的精神遗产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艰难转型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重大考验。如何继承和扬弃革命遗产中符合时代要求的理想与经验则成为政治发展中难以逾越的屏障。这部分分析了革命根据地的总的研究态势和存在问题,并试图通过典型事件的研究来阐发革命根据地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三是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研究近现代和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永远绕不开的政治人物是毛泽东。作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沁润和中国革命艰难环境中历练和成长起来的人民领袖,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基因和革命理想主义的双重影响。这种双重影响为毛泽东创建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理论体系奠定了思想基础,又为毛泽东实现国家富强、民族解放与人民幸福的目标提供了精神动力。这部分对毛泽东由改良到革命的历史转折、儒家大同思想对毛泽东的深度影响、毛泽东对分配问题的思考、对当代中国现代化目标的设计以及毛泽东本人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与评价等作了初步分析,揭示了毛泽东推进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轨迹。

四是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参与研究。如何有效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改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政治发展中的核心命题。党的几代领导人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面对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带来的问题,结合中国的国情稳步推进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政治参与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它可以为国家、社会与个人之间搭起桥梁,并有效矫正政府的行为与公民意愿之间的失调和冲突,使政治体系稳妥高效运转。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中,执政党提出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并表示要在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的基础上,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这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与政治参与研究的进展进行了梳理,对部分群体的政治参与以及政治竞争、政治共识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五是理论创新与意识形态研究。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与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早在建国之初,毛泽东就大声疾呼:“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也告诫全党:“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毛泽东与邓小平等党的领袖的精辟论断,为党的理论创新和意识形态工作奠定了基础。这部分对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和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内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的曲折发展、党的学风观、民族精神培育、中国梦与中国道路、网络与思想政治工作等。

本人深知,在中国从事政治发展研究有很多困难,但“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荀子·修身》)。出于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与中国共产党为何能领导革命成功的兴趣,我在授业恩师马洪武、王德宝、许光帐、张永桃、茅家琦等先生的引导和教诲下,开始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由于本人十分愚钝和学术功力尚浅,没有做出让先生们感到自豪的学术成就,敬请先生们原谅。

在我的学术成长过程中，我的爱妻孙虹女士尽管在大学时代十分优秀，但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尽心竭力教育培养孩子，承担繁重的家务，全力支持我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这才使我有今天的一点点成果。在此书付印之际，我要向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敬意。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同事、硕士生和博士生们在与本人共同研究中付出的劳动。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宋代·朱熹）作为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研究者，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要敢于直面中国社会的现实，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勇气，兼收并蓄，融汇中西，积极探索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和法治中国的构建途径，为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王明哲

2014年5月20日于南京海德卫城听涛斋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目 录

131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141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148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152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167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180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190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202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

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余英时文集

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

儒家治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003

十月革命前社会主义思潮在华传播的特征 013

“问题与主义”之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萌芽 024

罗素的两大命题与 20 世纪初社会主义论战的再审视 039

革命根据地与政治发展研究

革命根据地史研究十年 059

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述评 073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建设 080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廉政监督与监察 087

新四军历史事件研究中的若干热点问题 098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廉政建设的历史经验 104

陕甘宁边区劳模运动的政治分析 116

☐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研究

由改良到革命:青年毛泽东的艰难抉择	131
毛泽东与解放思想	141
毛泽东咏雪词引发的政治风波	148
儒家大同思想对毛泽东设计中国社会模式的影响	155
“大跃进”前后毛泽东分配思想述论	167
试析毛泽东的现代化目标设计与政策选择	180
毛泽东“放权”改革的路径与特征分析	196
毛泽东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	205

☐ 政治体制改革与政治参与研究

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	22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40
革命视角下的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研究	271
当前中国的政治参与:再制度化视角	283
论中国特色的政治竞争与政治共识	296
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现实与网络两种方式的比较	308
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探析	324

☐ 理论创新与意识形态研究

理论创新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	335
中共三代领导人的学风观	350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	358
经济全球化与弘扬培育民族精神	367
邓小平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	374
切实加强对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	385
网络与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	391

儒家治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社会思潮与政治发展研究

儒家治政伦理是我国封建政治伦理的核心。它在本质上反映着儒家政治伦理的道德追求、价值取向、目标选择和道德实践,体现着社会利益的分配和社会化的行为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封建政治制度能够在一系列的伦理原则的规范、调节、控制下有序运行。今天,当我们对其重新审视时,不难发现其精华部分,对当前道德建设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德性人格,儒家治政伦理的道德追求

周秦以来,儒家创立了一套完整而缜密的德性人格学说作为治政道德基础,以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

儒家的德性人格,最初是作为先儒追求个人成仁成圣的道德人格的体现。孔子认为,理想的人格是道德化的人格。他从“君子志于德”的道德目标出发,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表明德性人格的塑造是一个道德自觉的过程,并依此提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崇高人格目标。在此同

· 本文发表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国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儒家治政伦理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治政伦理是我国封建政治伦理的核心。它在本质上反映着儒家政治伦理的道德追求、价值取向、目标选择和道德实践,体现着社会利益的分配和社会化的行为模式,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封建政治制度能够在一系列的伦理原则的规范、调节、控制下有序运行。今天,当我们对其重新审视时,不难发现其精华部分,对当前道德建设中遇到的困惑和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德性人格:儒家治政伦理的道德追求

周秦以来,儒家创立了一套完整而缜密的德性人格学说作为治政道德基础,以满足社会政治的需要。

儒家的德性人格,最初是作为先儒追求个人成仁成圣的道德人格的体现。孔子认为,理想的人格是道德化的人格。他从“君子志于德”的道德目标出发,强调“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表明德性人格的塑造是一个道德自觉的过程,并依此提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崇高人格目标。在此同

* 本文发表于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儒家伦理与公民道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时,儒家的人格目标又与社会政治紧密相连,其伦理导向要求个人、家庭绝对服从于国家、社稷、君主利益。因此,儒家的德性人格学说,作为一种文化深层的价值取向模式,始终贯穿社会的政治组织结构之中。儒家倡导把内心修养所得的道德观念通过实际行动贯彻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企盼一个理想的“礼道大同”的道德化社会,正是儒家人格观的政治归属。

在儒家看来,“仁”不仅仅是一种社会政治理想和最高的道德规范,也是理想人格的核心内容,是人格美德的最高境界。“仁”的根本标志是“仁者爱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样的仁者“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能把“仁义”最完善地体现出来。故孔子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荀子则更明确地指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此外,儒家经典之一《礼记·大学》还着重强调了道德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要求行政者自我完善道德品质,塑造理想人格,满足社会政治需要。“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欲正其心,先诚其意;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致。”因此,为了塑造一种理想的德性人格,孔子一再呼吁统治者认真对待其自我道德修养的完善,认为它对国家安定、政权巩固有决定性的作用。他在回答樊迟时说过,在上者如果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又认为,“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由此可见,儒家要求统治者修身以健全德性人格,实质上就是要求统治者克制私欲,不以权谋私,纵欲贪得。并同时强调“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也即是说只有较高的道德修养的执政者,才会重视教化;教化被重视,官风也便端正;官风端正,国家就能管理好。

针对战国中期的士阶层为适应各国纷争的局面,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和治国治军的才能,纵横捭阖,游说诸侯,借助新兴封建贵族的权势跻身于统治

者的行列,以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现象,孟子慨然指出,这些为求禄位而不择手段,唯国君之命是从的人,虽然一时建立了显赫的功业,左右了当时的政坛风云,但由于他们都缺乏自身理想人格的追求,而不可能真正实现自身的价值。他说:“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作为士,要想实现自身的价值,就必须培养自身的理想人格,将天赋的道德品性在行动中体现出来。依靠外界的权势去获得高位,并不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条件,人的价值应在于人本身。

孟子认为,人实现自身价值要具备三个条件:“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即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能做到这些,就实现了理想人格。至于能否实现一个人的政治抱负,并不影响其自身价值。一个人如果得了志这当然更好,但作为士阶层的一个成员,如果不能得志,即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话,那就应当独行其道。儒家把士的不得志叫做“穷”,即身处逆境;把得志叫做“达”,即身处顺境。孟子特别强调要能做到:“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这即要求“士”在处逆境时不能失义,处顺境时不能离道。因为“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对士来说,穷或达,只是自身的遭遇不同,即所处的客观环境不同,与人民百姓的关系不同。所有这些都不影响士自身价值的实现。如果有所区别的话,只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不同,即“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泽加于民和兼善天下,这对士来说都是不易做的。因为要做到这些,不但要有地位权势,还需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好保证做到“富贵不能淫”。孟子认为,有地位权势的人,容易恣意妄为,天生的善性容易为地位权势所乱,丧失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因此更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更应当注意自身理想人格的追求。

总的来说,儒家治政伦理中的崇高的道德追求,往往成为实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无私奉献、勇于牺牲的爱国爱民行为的精神支柱。从先秦儒家所强调的孔、颜之乐,到范仲淹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已经凝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特有道德追求。“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唯义所在”，就是这种道德追求在人生观、价值观中的体现。其结果使封建社会出现了一批经国治世、拯民厚德、乐而忘忧、坚贞不屈、刚毅果断、执着不移的封建治政偶像。

出利入义：儒家治政伦理的价值取向

出利入义，指的是道义重于利益，君子必去利而取义。与出利入义意思相近的还有“以义制利”、“去利存义”、“先义后利”等等，其要旨是治理国家究竟是以义导民，还是以利诱民。

在先秦，孔子、孟子、荀子都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出利入义问题。孔子把义利之分看成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他认为，君子要见利思义，而不要放于利而行，要用义制利，而不要用利制义。他提倡：“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在孔子看来，求利而轻义，终归不利，唯有义然后有利，故“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忧义不忧食。

和孔子一样，孟子也把志利或志义作为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尽心上》）在孟子看来，讲义为善，就是舜；为利多欲，就是跖。义利之分，也就是君子小人之分。

至于荀子，他虽然认为义利都是人之所有，但他主张“以义制利”，反对“唯利之求”。荀子认为，“君子之求利也略，其远害也早”（《劝学》），“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辱》），因此，他的结论是：君子修身，“必以公义胜私欲”。

到汉代，董仲舒着重宣扬贵义贱利。他认为，利只能养体，而义却可以养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春秋繁露·身之养莫重于义》）剔除董仲舒及宋明理学家对儒家义利关系的扭曲外，儒家基本思想是强调在义利相矛盾、相冲突的情况下，应当以义为重。在这里“义”主要是指整体利益，“利”主要是指个人的自私自利。对于一般的利，孔子不但不反对，而且主张国家要“因

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所谓：“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其所谓利皆指私利。

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还表现在对生与义的选择：舍生取义。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这就是认为，在生命与道德理想不能两全的时候，宁可牺牲生命而实践道德。如宋元之际的文天祥、明清之际的史可法等等。

由此可见，儒家强调“出利入义”、“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舍生取义”等都是从国家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原则出发，处理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群体的关系的。因此儒家治政伦理中的义利观，在剥除其为封建国家服务的消极一面之后，可以看到其中渗透着一种为国家、为民族的公利而牺牲个人私利的强烈要求。孟子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亦正是这种献身精神的悲壮反映。

以民为本：儒家治政伦理的目标选择

以民为本是儒家治政伦理的重要内容。就儒家治政伦理的自身体系而言，民本主义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约束极端专制主义和皇权观念的作用。

“大同世界”说是一种典型的以民为本的治政伦理思想。孔子是“大同世界”思想的首创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任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样一幅“大同世界”的图景中，公有观念、平等观念和互助观念等，都集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的利益、愿望和要求。

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的口号，则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儒家治政伦理中的民本思想。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

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圯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则，善教得民心。”这里孟子着重强调了“民”及民心的重要性。一方面，他看到了争取人民支持，对地主阶级取得政权巩固统治的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要争取人民支持的关键在于得民心，并指出善于用行政方法治理人民，不如善于实施教育能得民心。因此，他认为民能“载舟”，也能“覆舟”，欲得民心，其关键在于统治者能“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所主张的统治者应“乐民之乐”、“忧民之忧”的主张对人民是有利的。对此，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非常重视，其民本思想亦获得发展。后世儒学思想家则进一步指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由居于上位者，简士若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与民为敌者，民必胜之。”“夫战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教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能以存矣；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鉴于此，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已取得的政权的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亦提出了一些重民的主张和措施。如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发出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感叹，并告诫群臣：“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舟，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苦弊。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朕每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教以成其福。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正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有了上述认识，才有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

因此，如果历史地考察，我们会发现，儒家所崇尚的保民、恤民、惠民、养民、富民、教民的人本主义精神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往往成为忧国忧民的思想家们批评极端专制统治的思想武器，并为部分开明君主和官绅接受，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发展。

选贤任能：儒家治政伦理的实现途径

儒家德性人格的塑造目的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何治国，儒